



北京大学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题目: 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姓 名: 郭丛斌
学 号: 10367807
院 系: 教育学院
专 业: 教育经济与管理
研究方向: 教育经济学
导 师: 闵维方 教授
副 导 师: 丁小浩 教授
李文利副教授

二零零六年六月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的数据,就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定量实证研究。论文首先运用国际上通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验证方法探讨中国职业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其次,论文通过代际继承性指数和代际流动性指数等指标分析中国城镇居民职业、行业和收入代际流动的状况及其所呈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特征;第三,论文运用通径分析技术、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探讨教育在促进代际流动及改善代际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方面的功能,分析教育的这一功能随中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所呈现出的变化趋势,并对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原因解释;第四,论文通过构建多水平模型,分析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这三个宏观层次因素对教育促进代际流动能的影响。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 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职业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劳动力市场具有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弱分割特征,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也存在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的分割。人力资本投资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收益大于在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收益,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也要大于在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的收益。在三大地区之间,职业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减弱。

(2) 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存在较为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特征。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城镇职业代际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逐渐减弱,居民职业的代际流动程度日趋增强,而收入的代际流动却日益减弱。在三大地区之间,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行业的代际流动程度日益增强,行业代际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逐渐减弱。

(3) 教育具有改善代际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功能。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有利于促进弱势社会群体的子女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跃升,有助于改善代际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具有较强的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在三级教育当中,高等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最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子女的职业和行业代际流动性最强。此外,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日益增强。

(4)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教育规模的扩大和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分布这三个宏观因素有助于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实现。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分割 教育 代际流动 职业 行业 收入

178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gmented Labor market in China

Guo Congbi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Directed by Professor Min Weifang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n condition that there is some form of segmented labor market in China. Utilizing individual data from Chinese Urban Household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Survey-2004(CHUHEES-2004), the author firstly examines the hypothesis of segmented labor market for China. Secondly, by adopting the structural flow rate, the exchange flow rate, the flow and inheritance indicator, the researcher has analy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form of segment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occupation, industry and income. Thirdly, the author uses the method of path-analysi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to find out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promoting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Lastly, the dissertation applie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economy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the disper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upon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promoting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Major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Apparent evidence is founded to suggest that there is some form of segmentation both in occupation and industry in the labor market of China tow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the extent of segmentation diminishes.

(2)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re exists serious segment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town. Fathers' occupations, industries and income have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their children's choice of occupations, industries and income. In the movement of labor market system, the degree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 mobility decreases, while the degree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creas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the ext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dustry mobility improves.

(3) It is proved by evidence that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weakening the degree of segment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t redounds to the offsprings of lower status to jump up to higher status. The higher a laborer's educational level, the more likely he or she gets the jump.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market, the role of education enhances.

(4)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y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the equ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are beneficial to make education play th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Key words: segmented labor market; edu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ccupation; industry; income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问题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	5
第二章	文献述评	9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	9
第二节	代际流动理论研究	18
第三节	职业代际流动的实证研究	22
第四节	收入代际流动的实证研究	29
第五节	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	35
第六节	相关研究小结及研究目标	38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44
第一节	理论框架	44
第二节	研究设计	49
第四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	54
第一节	计量方法	54
第二节	中国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	56
第三节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	6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66
第五章	代际流动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69
第一节	计量方法	69
第二节	职业代际流动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74
第三节	行业代际流动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84
第四节	收入代际流动	91
第五节	本章小结	98
第六章	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分割中代际流动的作用	102
第一节	计量方法	103
第二节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职业代际流动	108
第三节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行业代际流动	121
第四节	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	127
第五节	教育与代际流动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33
第六节	本章小结	138
第七章	影响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因素	142
第一节	计量方法	142
第二节	影响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多水平分析	147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55
第八章	结论、政策性含义及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157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

公平和正义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尺度,是千百年来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思想,表现出追求一个公平和均等社会的强烈愿望。宋代王安石推行改革变法,主张抑制豪强,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近代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无独有偶,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的柏拉图,近代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也曾对西方社会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进行过多方面的深刻探讨(刘相和陈家付,2005)。古今中外的这些学者和政治家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期待和设计,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向往。代际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追求代际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合理的代际流动有助于促进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是指不同家庭出身的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子代社会成员在各类资源的获取和社会地位的实现过程当中,受父代社会成员的影响较少;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流向强势社会阶层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强势社会阶层子女继续滞留在强势社会阶层的可能性则相对较小。社会公平包括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和代际公平(Psacharopoulos和Woodhall,1985),追求代际公平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代际流动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式与暴力式两种类型。和平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中国古代和平式代际流动的机制包括参加科举考试、行医和当兵等。暴力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推翻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优势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中国历朝历代中胜利的农民起义即是暴力式代际流动的典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由社会底层的农民跃升称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和平式与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相对较强,政府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在承认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活力,把

社会资源和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从而使得社会关系得以协调处理，代际公平得以保证。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实现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即社会地位较高阶层劳动者的子女拥有比其父母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低于其父母的社会地位，最终使强者子女更强，而弱者子女更弱。这种马太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破社会成员所能容忍的程度，就容易引发暴力式的代际流动。因此，缺乏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将会削弱整个社会的代际流动程度，损害代际公平，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

代际流动的一般规则有两个基本类型：先赋性规则和后致性规则。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先赋性规则往往以传统的农业主导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构造为基础，在这种规则下，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其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即家庭背景。相形之下，后致性规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构造为基础，在这种规则下，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地取决于其后天的能力和努力，如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等（陆学艺，2004）。当然，这两种原则在一个社会中并非在唱独角戏。在传统社会中，先赋性规则是其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但后致性规则也会对代际流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样，在现代社会中，后致性规则是其主要的代际流动规则，但先赋性规则仍然会对代际流动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有时这种阻碍作用甚至比后致性规则的促进作用还要强，一旦这种现象持续时间过长，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就会被破坏，社会矛盾容易被激化，整个社会将难以和谐。

二、中国代际流动状况的历史回顾

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现正逐步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国代际流动状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俗语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代际流动状况的生动写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自给自足是社会的基本特征，农民是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在这一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中，社会成员的资源获取能力和社会地位主要通过世袭获得，而参加科举考试，以期金榜题名是许多社会弱势阶层劳动者子女获得较强资源获取能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最有效途径。他们通过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从而摆脱其祖祖辈辈世代的宿命轮回。但纵观整个传统社会，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社会地位跃升的社会成员毕竟属于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弱势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在社会地位的金字塔中，

只能占据与其父母大致相同的位置；而绝大多数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在其父母的庇佑下，亦能世代享受荣华富贵，身居社会地位金字塔的顶层。在此种社会结构下，代际传递是其最基本特征，先赋性规则是社会流动的基本法则，整个社会较为封闭。

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间段当中，中国实行的是单一所有制结构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种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对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均掌握在政府手上，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弱，尤其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各种分割，比如城乡分割、所有制类型分割和职业分割等，使得不同类型劳动者之间的流动更为困难。与城市劳动者相比，农村劳动者是弱势群体，他们不能享受城市人所拥有的子女教育、健康医疗、住房和食物补贴等方面的福利；与全民所有制和部分集体所有制劳动者相比，其他所有制劳动者也属于弱势群体，他们不能享受终身制、养老和子女入托等福利；与干部相比，工人亦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能从事管理工作，接受培训和提升到党政部门领导的机会也比较少。这种制度划分人为地为不同类型的人员流动设置了障碍，这些障碍使得不同类型人员之间的流动较为困难，这种人员的流动困难使得代际之间的流动较少，整个社会较为封闭。

当然，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一定的代际流动机制，例如农村劳动者的子女可以通过上中专、上大学、或参军实现其户籍的转变，从而实现其社会地位的跃升。此外，这一时段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特别注重吸纳来自较低社会位置群体的成员，从而导致了一个相对平等化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出身较低社会阶层的人进行向上流动（李春玲，1997）。换言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先赋性规则和后致性规则在促进代际流动的作用方面，更多地受到国家政策制度安排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逐步实现从单一所有制结构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迅速提高，个人自主择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的开放性也愈来愈强，这些都为代际流动提供了必要条件。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的职位也迅速增加。1978-2001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6%，而职业岗位点增长率为3.41%，职业规模从4亿个增加为2001年的7.3亿个。职业总量的绝对增长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为职业间的流动拓展了空间（陆学艺，2004）。职业数量的增长加速了整个社会的代际流动。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有利于代际流动的因素，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存在一些有碍于代际流动的因素，如计划经济时代的“顶替”和“接班”等子承父业的现象在改革开放后的潜在影响；两千年传统文化下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的影响；父亲对于子女才能的代际传递和家庭对于子女潜移默化的社会

化影响等。这些因素将会强化社会成员资源获取能力和社会地位的代际效应，使强势群体子女仍然强势，而弱势群体子女依然弱势。那么在这两股正反两方面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将会呈现一个怎样的特点呢？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劳动力市场内部的差异日益明显、社会分层日趋显著。不同职业和行业的收入和福利差距日趋扩大，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日益凸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将使中国代际流动的范围也可能会呈现一定的分割。换言之，整个社会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表面上虽然呈现一定的向上流动性，但其向上所流向的职业依然囿于弱势社会阶层，仍然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虽然向下流动，但其流动范围仍然限于在强势社会阶层的职业之中，仍然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在此情况下，虽然社会的代际流动性较强，但这种流动范围的分割性将会严重抹煞代际流动所带来的开放性，这将不利于社会公平，有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鉴于此，探讨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中国代际流动的特点将会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三、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

如前所述，后致性规则主要是指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其后天的努力和能力。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作为衡量其个人能力的一个有效信号，对其社会地位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中国，接受教育、参加科举成为众多社会底层劳动者子女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捷径之一。对于统治者而言，通过教育这种相对公正的筛选工具选拔人才，以保证社会正常有序的流动则是他们维系社会稳定的一种利器。唐太宗李世民目睹众多举子在规规矩矩列队进入科举考场时所发出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之感慨，充分体现了教育在统治者选拔人才，维系统治过程中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鉴于教育在吸纳人才，维护统治方面的功能，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教育都非常重视，这使得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得以较大程度的发挥。

时至工业社会，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各类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要求有大量接受过足够教育的劳动者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接受足够的教育成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获得较好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就有更多的机会实现代际流动，以流向比其父母更高层次的职位。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提高，一些新兴的职业和行业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的职业和行业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程度一般具有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此情况下，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作用如何，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

高,这种作用的方向和强度将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变化趋势?这将是本文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四、影响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因素

先赋性规则和后致性规则是代际流动的两大规则。这两大规则的作用模式还会受宏观制度政策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社会制度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教育规模和教育机会分布的条件下,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程度可能不尽相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总量的增长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近几十年来,教育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22.8%下降到1990年的15.9%,又下降到2000年的6.7%,年均下降6.5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按每年3.66%的平均速度递增。我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33年提高到2000年的7.85年,增加了2.52年,提高幅度达到47.28%,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幅高出3.6个百分点,接近世界平均增幅的4倍(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2003)。

在基础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也开始逐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到1999年则开始进行大规模扩招,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从1998年的108万人,扩大至1999年的160万,2001年的268万和2005年的475万。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展,高等教育机会总量也迅速增加。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推行,高等院校的学费日趋见涨,一些弱势阶层子女因无足够经济支付能力而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这使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有鉴于此,笔者将探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机会总量和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与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关系作为本文研究的第三个问题。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主要探讨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改革开放后,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中国现阶段的代际流动有何特点?(2)中国教育在促进代际流动方面的作用如何?(3)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机会总量和高等教育机会分布对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有何影响?

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探讨教育的功能是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教育经济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中,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提高劳

劳动者收入的功能。筛选理论认为教育并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但它具有传递劳动者能力高低信号的功能，是一种帮助雇主筛选求职者的手段或装置。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当中，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的功能并不在于通过提高个人生产率来提高个人收入，而在于决定一个劳动者在主要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认为教育的功能只不过是再生产原有的生产关系，它对弱势社会阶层劳动者子女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上世纪80年代，Carnoy和Levin在教育经济学三大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对抗论”，他们认为民主国家的教育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为社会弱势群体向上流动提供可能性机会。

纵观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经济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其发展动向正逐步由传统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转向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发展（曲恒昌和曾晓东，2000）。本文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引入社会学的代际流动问题分析教育的功能，有利于促进教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符合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本文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抗论和代际流动问题相结合，探讨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有助于丰富社会公平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对抗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本文改变传统代际流动研究中只考虑职业或只考虑收入代际流动的研究模式，将职业、行业和收入这三个维度综合考虑以分析中国的代际流动特点，有助于丰富代际流动研究；用教育经济学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对抗论分析代际流动问题，有利于增加社会流动研究问题的理论色彩。另外，对于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对抗论，许多理论批评家所指出这两种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其定量实证研究和计量分析的色彩较弱。本研究将试图通过定量实证分析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教育的社会功能，从而探讨赋予这两个理论更多的计量和定量实证色彩。

根据代际流动的通畅程度，人类社会可以分为封闭性社会和开放性社会。在封闭性社会里，代际流动闭塞受阻，一个人自出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在其父辈所属的阶级和阶层里终了一生，代际流动的机会非常少，要想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许欣欣，2000）。这将使得“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一些能力不强但出身优势社会阶层之人会滞留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层，而这些素质较差之人会驱逐素质较好但出身劣势社会阶层的子辈，有损社会公平。而在开放性社会里，代际流动畅通无阻，几乎每个阶级和阶层的大门都是敞开的。

“布衣可为卿相”和“由木屋到白宫”所代表的就是社会流动畅通的开放性社会（许嘉猷，1990）。与封闭性社会相比，开放性社会具有更好的代际流动机制，

弱势群体劳动者的子女可以通过自身后天的努力摆脱父辈的不利影响，进入优势社会阶层。而优势社会阶层子女子女，并不能因为具有所谓的“高贵血统”就能够长期滞留于优势社会阶层，他们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就会被优势社会阶层所淘汰，流入劣势社会阶层群体中。在这种开放性社会中，代际流动的管道较为通畅，父辈和子辈在社会中的位置并非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社会公平能够得以较大程度的实现。

代际流动较为通畅的开放性社会，除了社会公平性明显优于封闭性社会之外，其各种物质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也要明显高于封闭性社会。在一个封闭性社会中，社会的代际传递现象严重，代际流动的障碍难以跨越。整个社会任人唯亲，不看个人的后天努力，只看其家庭出身。这将使得用人单位可供选择的职员范围缩小，整个社会的用人制度难以做到任人唯贤，用人单位寻求胜任工作之人的成本较高，社会成员难以做到人尽其才，人力资源也无法达到有效配置。另外，在一个封闭性社会里，由于缺乏代际流动，社会成员在“呱呱坠地”时，一生的命运就已决定，整个社会缺乏竞争和向上流动的动力，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也就是说，缺乏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将会损害整个社会的效率。

古代中国代际流动的可能性途径有很多，如行医、当兵和读书等（周荣德，2001）。步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和相关国家制度政策的调整，读书受教育这一代际流动途径的重要性日趋明显，而其他代际流动途径则日益弱化。在现代政治体制和教育体系下，弱势社会阶层子女要想通过当兵实现社会地位跃升，单纯通过参军当士兵已经很难实现，他们大部分都得通过到专门的部队院校接受教育成为士官，才有可能实现“鲤鱼跳龙门”。同样，弱势社会阶层子女要想通过行医实现地位晋升，仅仅通过当学徒掌握一些中草药知识，业已很难实现，他们大部分也得通过到专门的医科学校接受教育才有可能实现代际流动。换言之，现代社会的社会成员如果想通过当兵和行医实现代际流动，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很难实现。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原有当兵和行医这两种方式所承担的代际流动功能，在现代社会已经更多的转交由教育来承担，这使得教育在现代开放性社会中愈来愈成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在弱势群体子女向上流动过程中承载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本文对于逐步步入工业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教育在促进代际流动、维系社会公平和提高社会效率过程中的作用。

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逐步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当中，各种资源和机会将会面临不断的再分配，

整个社会原有的社会关系也必然面临重组，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必将被重构。在这一过程当中，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阶层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因此，政府必须建立起协调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解决矛盾冲突的缓解机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机制（李培林，2004）。转型时期社会的代际流动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此时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这一时期的代际流动机会较少，原有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会得以世代延续，已有的利益格局也会代代相传，非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就难以得到满足，这将加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则能够对这一矛盾和冲突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因此，本文对于代际之间社会地位的流向，以及教育这一代际流动机制在其中作用的探讨，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开发和完善促进代际之间合理流动的途径和机制，保证社会开放、公平、健康和稳定地发展。

社会公正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弱势群体是坚持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培林，2004）。本文对于弱势社会阶层子女的代际流动状况，以及弱势社会阶层子女教育对其进入优势社会阶层的作用，将会引起人们对弱势群体的代际流动机制的关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现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伴随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之间差距亦越来越大，这些将会破坏社会和谐。教育除了具有提高劳动者收入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功能之外，它还具有重构社会关系、缩小收入差距、促进代际流动、保证社会公平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本文对于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探讨，将会启发人们在重视教育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教育促进代际公平、维系国家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功能。

此外，本文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与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关系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在内的宏观制度环境对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影响，有益于人们把握宏观制度环境与教育这一代际流动机制之间的运行规律，这将为教育行政部门就有关教育投资和保证教育机会公平等方面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

第二章 文献述评

公平和效率是探讨教育功能的两大视角,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是分析教育功能的两大维度。现有关于教育提高个人经济收入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效率的角度探讨教育的经济价值,如萨卡洛普罗斯、明瑟、陈晓宇等人有关教育收益率的研究(Psacharopoulos.1970; Mincer, 1970; 陈晓宇, 1999)以及舒尔茨和李宝元等人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研究(Schultz, 1963; 李宝元, 2000);关于教育能够保证收入分配公平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平的角度探讨教育的经济价值,如舒尔茨、Ram和赖德胜等人有关教育与收入分配的研究(舒尔茨, 1990; Ram, 1990; 赖德胜, 2001)。相形之下,从公平角度探讨教育的社会效益,如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系统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文献搜索的关注点首先锁定在有关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研究的文献当中。

社会流动内容广泛,从社会流动的范围来看,社会流动包括国家间的流动、地区间的流动、省际流动、城乡流动、职业流动、收入流动和行业流动等。从流动的主体来看,社会流动可以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代内流动主要讨论的是劳动者主体一生中的工作流动状况,如布劳和陈婴婴有关初始职业和现在职业的关系研究(Blau和Duncan, 1967; 陈婴婴, 1995);而代际流动主要探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工作职位的关系。由于本论文主要关注的是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问题,因此有关代际流动的研究将是本文文献综述的重点。

代际流动包括代际之间的城乡流动、职业流动、行业流动和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等。在现有代际流动的文献中,有关职业代际流动和收入代际流动的研究相对较多,因此本文将把代际流动中的职业代际流动和收入代际流动作为文献综述中的重中之重。

另外,由于本文将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试图将代际流动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相结合,探讨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教育与代际流动之间的关系。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方面的研究也是本文文献综述的重点。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将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代际流动理论、职业代际流动、收入代际流动、以及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作用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

继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后,全球各地掀起人力资本投资的浪潮,各国政府纷纷投资教育,试图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并解决贫穷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但事与愿违,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贫穷问题仍然持续;

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歧视现象非常严重；教育与培训严重失效。这些现象用人力资本理论无法解释。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一些劳动力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政府管制等视角引入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当中，批判和继承了劳动力市场古典模型，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自 Doeringer 和 Piore 提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后，许多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研究者通过相关数据的分析，对各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进行实证检验。本部分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实证研究的文献综述将分别从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来进行。

一、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

（一）两个经典研究假设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整个社会存在两个工作特征完全不同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其工作相对稳定、能够得到明确和合理的晋升、教育和培训能够提高其收入；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无法获得明确和合理的晋升、接受教育和培训对于提高其收入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流动（Doeringer 和 Piore, 1971）。有鉴于此，有关各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实证检验的研究一般先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继而通过对以下两个经典假设的验证来检验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

经典研究假设一：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职的劳动者所获得的收入明显高于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职的劳动者。

经典研究假设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

（二）主次劳动力市场的划分方法

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研究者主要通过劳动者的职业来划分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其劳动力市场的划分方法可归纳如下：

1、按劳动者所属职业的职业等级来划分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职业是构建社会地位等级的重要分类标准，它能够反映一个社会成员所掌握的权力、收入和社会声望。McNabb 和 Psacharopoulos，以及 Neuman 和 Ziderman 的研究均

属此类，他们在职业等级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划分。

2、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来划分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次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人所接受的培训相对较多，而次要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大部分是生劳动力，所接受的培训相对较少。Boston 通过问卷调查，问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是否需要特殊的或者预先的培训，然后根据回答的结果，通过聚类分析，将各类职业划归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

3、通过建立转换方程来划分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研究者主要通过建立三个回归方程来实现。第一和第二个回归方程分别是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入方程，第三个方程是转换方程，满足方程特点的案例划归主要劳动力市场，不能满足方程特点的案例则划归次要劳动力市场。Basch 和 Ricardo、Dickens 和 Lang、Rebitzer 和 Robinson、以及 Sakamoto 和 chen 均通过转换方程实现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划分。

4、根据是否接受培训、是否有稳定工作和晋升机会来划分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Leontaridi 在对不同职业劳动者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将同时具有“接受培训”、“有稳定工作”和“有晋升机会”这三类工作特征的职业划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反之则划归次要劳动力市场。

（三）研究结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研究者对各国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实证检验结果并不一致。笔者借鉴筛选理论有关强筛选和弱筛选的分类方法，将这些实证研究结果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归纳为强分割、弱分割和无分割三类。其中，表明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即教育仅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能够提高劳动者收入，在次要劳动市场对提高劳动者收入没有作用的研究划归“强分割”；认为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但二者的界限不甚明显，即教育在主劳动力市场均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但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大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划归“弱分割”；指出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主劳动力市场的教育收益率不存在显著差异的研究则划归为“无分割”。这些研究中有关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和工作年限收益率的结果归纳如下（见表 2.1）。

表 2.1 国外有关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实证检验的研究

研究者	样本 国家	明瑟收益率 (%)		工作年限收益率 (%)		分割类型
		Primary	Secondary	Primary	Secondary	
Dickens & Lang	美国	6.7***	-0.3	1.3***	0.1***	强分割
Neuman & Ziderman	以色列	6.4***	-2	3***	0.3	强分割
McNabb & Psacha	英国	7.5***	5.5***	5.4***	4.3***	弱分割
Rebitzer & Robinson	美国	9.5***	3.9***	3.2***	2.1***	弱分割
Basch & Ricardo	智利	21***	9.8***	13***	6.9***	弱分割
Boston	美国	6***	3.2***	0.2***	0.1***	弱分割
Sakamoto & chen	美国	18.1	18.3***			无分割

注：打***号的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

1、有关强分割的研究

Neuman 和 Ziderman、以及 Dickens 和 Lang 的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严格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Dickens 和 Lang 通过计算美国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发现美国主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不尽相同。他们指出：主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教育收益率为 6.7%；而次要劳动市场受教育年限与劳动者的收入没有显著性关系。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年限的收益率为 1.3%，它对提高劳动者收入具有积极作用；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年限的作用几乎为 0（Dickens 和 Lang，1985）。

Ziderman 利用以色列劳动力流动调查的数据，根据职业等级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分别计算两个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分析以色列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其研究表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对提高收入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其中教育收益率为 6.4%，工作年限的收益率为 3%；而次要劳动市场的受教育年限与劳动者的收入均没有显著关系（Ziderman，1986）。

2、有关弱分割的研究

McNabb 和 Psacharopoulos、Bosanquet 和 Doeringer、Basch 和 Ricardo、Rebitzer 和 Robinson、以及 Boston 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但二者的界限并不明显。

Bosanquet 和 Doeringer 通过对比英国同一受教育程度的男性和女性工人的年龄收入曲线和工作稳定性，发现教育给男性和女性工人带来的收益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随着二者年龄的增大而逐渐增大。研究结果表明英国

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 (Bosanquet 和 Doeringer, 1973)。

McNabb 和 Psacharopoulos 利用英国入户调查数据, 以职业等级为标准, 将英国的劳动力市场分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 并分别计算整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主要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 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都与劳动者的收入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分别为 7.5% 和 5.5%, 工作年限的收益率分别为 5.4% 和 4.3%。也就是说, 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和工作年限的收益率略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 (McNabb 和 Psacharopoulos, 1981)。

Boston 利用美国的人口调查数据, 以某一职业是否需要特殊的或者预先的培训为标准, 通过聚类分析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 主次劳动力市场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 6% 和 3.2%, 二者工作年限的收益率分别为 0.2% 和 0.1%。此外, 作者在此基础上, 还对比男性白人、男性黑人、女性白人、女性黑人这四类人群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差异, 其结果表明在四组人群当中, 男性白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最轻, 而男性黑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最严重 (Boston, 1990)。

Rebitzer 和 Robinson 利用美国人口调查数据, 通过建立转换方程模型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探讨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 并分析公司规模和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分别为 9.5% 和 3.9%, 二者工作年限的收益率分别为 3.2% 和 2.1%。另外, 其研究还指出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 主次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Rebitzer 和 Robinson, 1991)。

Basch 和 Ricardo 利用智利从 1980 到 1989 这十年的数据, 通过建立转换方程模型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 探讨智利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其研究结果表明智利存在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提高主次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都具有正向影响, 两个劳动力市场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 21% 和 9.8, 二者相差 11 个百分点; 主次劳动力市场工作年限的收益率 13% 和 6.9%, 二者相差 6 个百分点 (Basch 和 Ricardo, 1996)。

3、有关无分割的研究

Sakamoto 和 chen、以及 Leontaridi 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Sakamoto 和 chen 利用美国的人口调查数据, 通过建立转换方程模型将劳